

斯特林堡与奥尼尔：美国现代戏剧自传特色的形成

[德国]阿尔弗雷德·霍农
钟燕译

斯堪的纳维亚剧作家们对欧美现代戏剧的影响不言而喻。对于现代戏剧技巧和主题的出现,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和瑞典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分别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欧美戏剧家们欣然接纳了现代戏剧,他们努力让自己从19世纪情节剧的旧框框里跳出来。正如尤金·奥尼尔^①所言:大仲马的小说《基督山伯爵》被改编成戏剧,并且摒弃了情节剧的舞台风格,这可以说典型地标志了全新现代戏剧的问世。然而,有意思的是,易卜生和斯特林堡对其后剧作家们的影响各有特点,不尽相同。爱尔兰戏剧家乔治·萧伯纳对易卜生的社会批判思想非常接受,并将其运用到了英国戏剧中。相比之下,斯特林堡的影响似乎小了。同样,沿袭自然主义传统的德国剧作家们先选择了政治社会戏剧,只是后来才转向了表现主义。斯特林堡“地狱后”时期的剧作^②在德国的上演相对甚少,由此可见其不被接受的程度。他的戏剧中只有《一出梦的戏剧》的上演影响了一战以后的表现主义剧作家们。^③与整个欧洲大陆对斯特林堡的迟疑犹豫相反的是,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自称对这位瑞典戏剧家终生迷恋,从斯特林堡

^① 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在1920年接受的一次采访中说道:“我以为……我是在老式剧院周围长大,这种剧院是和我父亲一样的,所以我认为应该进行反抗,朝新的方向前进,这是非常自然的。”引自吉尔波(Arthur and Barbara Gelb)《奥尼尔》(O'Neill),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4, 页451。

^② 指斯特林堡在克服其1896—1897年写作自传作品《地狱》(Inferno)而遭遇生活危机之后创作的剧作。

^③ 伯格(Klaus van den Berg)认为斯特林堡戏剧具有后现代演出的特点,可见于波纳尔(Rudolf Bernauer)1916年在柏林赫伯尔剧院(Hebbeltheater)的演出,与之相对的则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1921年于德意志剧院上演的现代制作,似乎可解释斯特林堡对同代英国戏剧家的影响。见《斯特林堡〈一出梦的戏剧〉:现代主义舞台的后现代主义观点》,载《戏剧评论》(Theatre Survey)40.2(1999年十一月号):页43—46。

那儿找到了革新戏剧技巧的源头。^④我将在下文中探讨斯特林堡思想和尤金·奥尼尔理解中的现代美国文化的关系。我认为,相对而言,易卜生和萧伯纳戏剧中所讨论的社会问题被奥尼尔和他同时代的剧作家们忽视了,而这却促成了美国现代先锋戏剧在美国的兴起。而英国直到19世纪50年代才有现代先锋戏剧出现。奥尼尔从斯特林堡“地狱后”时期的剧作中得到灵感和启发,为美国现代戏剧开辟了道路。自19世纪40年代起,田纳西·威廉斯和爱德华·阿尔比继承了奥尼尔美国现代戏剧的创作风格。

美国戏剧的舞台布景与欧洲戏剧大不相同。原因有二:首先,清教徒们反对公开形式的娱乐演出,由于长期受清教徒思想的影响,戏剧文化在美国出现较晚。第二,在奥尼尔之前,美国事实上没有全国知名的剧院。整个19世纪里,英国剧团在美国巡回演出,与已经美国化了的欧洲情节剧和美国本土的流行演出形式相竞争。美国本土的流行演出形式有嘲讽非裔美国人的白人扮演黑人的音乐演唱会,在低级夜总会、帐篷和露天剧场进行的低价演出等。在这样的戏剧氛围下,加上看到做演员的父亲整整一年里都在参演亚历山大·大仲马的情节剧《基督山伯爵》,奥尼尔从斯特林堡的世纪转折点戏剧《死之舞蹈》(1901年)和《一出梦的戏剧》(1902年)里受到启发,于20世纪初独自开创了先锋独幕剧形式。奥尼尔一再强调,作为现代戏剧的范本,《一出梦的戏剧》对剧作家们摆脱情节剧和自然主义的模式影响重大。受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分析理论的影响,奥尼尔最初在描写海洋生活的一系列独幕剧中按照自己的思想创作,摒弃了传统戏剧中人物塑造和场景安排的方法。他的创新在独角戏《琼斯皇》(1920年)里尤为突出。奥尼尔运用斯特林堡的梦幻戏剧结构来处理一部美国奴隶的放逐史、一个从欧洲加勒比地区的殖民主义到美国的帝国主义的转变。显然,斯特林堡的梦幻戏剧结构对奥尼尔表现人物内心矛盾至为关键。

1924年,在一张宣告由州府先锋戏剧演员上演斯特林堡的《鬼魂奏鸣曲》(一部剖析中产阶级家庭的戏剧)的海报里,尤金·奥尼尔首次公开承认自己对斯特林堡的戏剧风格深感认同。他在戏剧海报里称赞斯特林堡这位斯堪的纳维亚剧作家为“我们当代戏剧现代性的先驱”,他“一直是现代剧作家中的最现代者,是舞台上人物精神冲突最伟大的阐释者。他所创作的人物精神冲突构成了戏

^④ 例如可参看文特尔(Sophus Keith Winther)《斯特林堡与奥尼尔:影响的研究》(“Strindberg and O'Neill: A Study of Influence”),见《北欧研究》(Scandinavian Studies),31.3(1959年八月号),页103—120;另见哈特曼(Murray Hartman)《斯特林堡与奥尼尔》(“Strindberg and O'Neill”),载《教育戏剧丛刊》(Educational Theatre Journal)18.3(1966年十月号),页216—223。